

# 试论唐朝“重北轻南”战略的失误

李巍巍

(大理学院图书馆 云南 大理 671003)

[摘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统治者实行的基本国策会对政权的稳固产生重要影响,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衰必然有其特定原因,历史上从没有不衰亡的帝国。唐王朝的衰亡,“重北轻南”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唐朝 衰亡 重北轻南 失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在它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统治集团不断调整内外政策,其中长期推行的“重北轻南”战略对唐朝的衰亡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试论如下:

## 一、“重北轻南”的原因初探

首先,政治重心在北方。自秦汉至隋唐,我国的政治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如: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魏晋南北朝许多政权也都定都于关中和河洛。这就导致政策重心也在北方。其次,唐朝延续了隋朝的“重北轻南”战略。隋朝是北方政权征服了南方政权后形成的大一统王朝,对南方实行歧视和镇压政策。而同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李唐王朝继承并延续了杨隋的“重北轻南”政策。本来李渊就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和大贵族,所用官僚也大多为前隋官吏,政策上的延续也就不足为奇。而且唐朝也是兴起于北方而又一次统一了南方的大一统政权。再次,唐皇室与北方胡人关系密切。自西魏以来,唐皇室数代与鲜卑贵族通婚,从生活习惯到血缘关系都已胡汉融合。太原起兵时,李渊就曾向突厥借兵,安史之乱时,又向回纥和大食借兵平叛,唐末,又借助沙陀和党项的骁骑镇压黄巢起义军。而且唐皇室多次下嫁宗室女与北方突厥、回纥、契丹、奚、吐蕃等少数民族通婚,并多次册封北方胡人王族和贵族,足见彼此关系之密切,但笔者在此强调这些人都是北方胡人。第四,与气候有关。南方素以蛮荒之地著称,长江三角洲在唐朝时已得到很大开发,从“烟花三月下扬州”就可以知道,但是再往南,如到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湿润且原始森林多瘴气,不适合北方中原人的生活习惯。西南地区也是瘴气弥漫,被内地人尤其是北方人视为蛮荒恐怖之地,天宝战争中远征云南洱海的二十万唐军“罹瘴役及饥死者十之七八”<sup>[1]</sup>导致全军覆没。第五,中央对西南一直未实现真正统一,自秦汉直至隋唐八百余年,历代对云南多数时期是间接控制或“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依然控制各自的区域,生产力水平极低,南北之间、南南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如西南的乌蛮、白蛮、广西的西原蛮等十分落后。而“蛮”是大民族主义统治者

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 二、“重北轻南”的具体表现

### (一)用人上的“重北轻南”

唐朝是以胡汉结合的西北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关陇军事集团自西魏、北周就已形成,以关中和陇西人为主,血统上胡汉融合,勇武彪悍。唐朝统治者历来重用关陇集团的人物,再加之唐皇室有北方胡人血统,唐朝能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可见唐皇室与北方胡人关系之密切。但这一民族政策是相对的,具有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以及民族局限性,在唐皇室把北方胡人视为一家人之时,却对南方少数民族存在歧视,视之为蛮。实行双重标准和待遇。如:从《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来看,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王族、酋长、将领、功臣恩赐国姓“李”,并封王封公加官进爵者不下数十起,而北方汉人大臣被赐国姓者也屡见不鲜,在唐朝,被赐国姓是头等荣耀的事,意味着政治地位提高,有了个“皇族户口”。这当然是唐朝统治者笼络北方少数民族,巩固统治的好办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胡汉一体化,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是,笔者注意到从这些人的籍贯看,几乎都是北方人,鲜有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汉人大臣被赐国姓者。从唐代诸多官员的籍贯看,绝大多数为北方人,而且山东旧世族占了很大比例,《新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世族子弟居然占到71%。正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所述:唐玄宗时,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平分,不克如是”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唐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sup>[2]</sup>山堂肆考云:唐宰相369人,98族,河东裴氏、博陵崔氏、清河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宰相17人,关中韦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及唐宗室以及关中杨氏、杜氏皆得11人,荥阳郑氏9人,范阳卢氏8人皆山东(太行山以东,今河北河南山东)关中(陕西)河东(山西)人士。<sup>[3]</sup>可见唐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关系。鲜

有南方籍官员,固然这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有关,以及与南方门阀在南朝时早已衰败有关,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统治者在用人上的“重北轻南”。科举考试形同虚设,南方广大庶族与寒门子弟可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被视为正路,中唐以后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导致唐穆宗以后出现了朋党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唐中后期政治上的黑暗,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 (二)军事上的“重北轻南”

军事上,唐朝北方和西北面临突厥(前期)、回纥(中后期)、吐蕃等强大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唐朝主要兵力布防于北方和西北。唐玄宗时设十个节度使:1.安西节度使 2.北庭节度使 3.河西节度使 4.朔方节度使 5.河东节度使 6.范阳节度使 7.平卢节度使 8.陇右节度使 9.剑南节度使 10.岭南五府经略。<sup>[4]</sup>八个在北方,只有剑南节度使和岭南节度使布防于广大南方。从兵力部署上看,当时全国约49万大军,南方两节度使总兵力不到5万人,约44万大军在北方。而安禄山一人就兼任河东、范阳、平卢三节度使,拥兵15万余,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和广大南方兵力空虚,兵力分布上的不恰当和实力上的不平衡,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导致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一蹶不振。中原经济萧条,北方尤其是河朔三镇拥兵自重,导致长期藩镇割据,生灵涂炭。而西北的吐蕃和西南的南诏却趁火打劫,大肆向内地扩张,使唐朝的整个防御体系处于被动局面。迫使唐军在西北的吐蕃和西南的南诏以及北方的藩镇之间疲于奔命。就南方而言,“安史之乱”后,南诏攻占了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大渡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南诏还多次趁唐朝在南方兵力空虚,不断侵扰川、黔、桂和安南(今越南北方),公元830年,南诏趁四川兵力空虚,一度占领成都西城。在唐朝援军尚未到达成都时,南诏军已掳掠了成千上万的技艺工匠,抢走玉帛财物无数,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被抢掠一空。公元859年南诏世隆派兵攻陷播州(今贵州遵义),公元860年南诏又趁安南唐军北上收复播州安南空虚之机攻陷交趾。第二年,又乘虚攻陷邕州(广西南宁)大肆掳掠人口。到南诏舜化贞时,希望双方修好,恰值王建在西川向朝廷上书《资治通鉴》卷261对王建的呈书有述:“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昭宗表示同意,对南诏的要求未予理睬。双方的政治联系至此中断。<sup>[5]</sup>唐对南诏的轻视,无疑带有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同时也是“重北轻南”战略的延续。导致唐与南诏相互征战,两败俱伤,最终双双灭亡的结果。而正在双方征战,彼此消耗之时,黄巢农民大起义爆发了,黄巢农民军在唐朝兵力集中的北方曾一度受挫,但在唐朝兵力空虚的南方迅速发展壮大,并一度

攻占京都长安,极大的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新唐书·南诏传》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sup>[6]</sup>南诏的袭扰和黄巢在南方的壮大很大程度上都是唐朝“重北轻南”战略的失误导致的后果。

## (三)经济上加重对南方的剥夺

在“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唐朝中央财政主要依赖北方经济区。“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但经过“安史之乱”,全国的人口从5000多万猛降到约1700万。钱穆的《国史大纲》记载:“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sup>[7]</sup>当时尽管南方人口逐渐增多,但人口总量仍然不大,而且南方各地经济发展也不平衡,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经济最发达,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延续了近一百五十年,中央财政主要依靠南方经济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赋税。韩愈谓:“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至唐末咸通年间又加甚,故陆龟蒙言:“元和中国家用兵,江南之赋已重逮今盈六十年,赋又数倍于前也”。如此重的赋税虽然维持了中央政权的统治,但是加重了南方人民的苦难。导致农民起义频发,如公元811年黔州地区爆发以蛮酋张伯靖为首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长达三年之久。后来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入南方后南方人民大量加入黄巢农民起义军,特别是湘、黔、桂苗族人民纷纷加入黄巢起义军,一直打到桂林城下。沉重打击了唐王朝在南方的统治。

## 三“重北轻南”的结果探析

笔者认为唐朝“重北轻南”战略的失误导致以下结果:

### (一)导致唐末南北方大分裂

唐末,北方的藩镇势力越来越强,尤其是镇压了黄巢农民起义军之后。导致中原地区长期陷入战乱,经过长期的藩镇割据和兼并战争,唐朝中央政府已名存实亡,受制于藩镇势力。而南方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经济发达,而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等地则发展滞后。两广和海南甚至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如李党头子李德裕曾被流放到崖州(今海南),当时有诗:“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当时岭南地区的落后,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加剧了政治上的不平衡,加之南方藩镇势力的壮大和地形上的阻隔,如南北方有长江天险的阻隔,四川北有秦岭南有长江东有三峡,而岭南地区北有五岭天险,这些地区在唐末都具备了分裂割据的条件。加之南北方藩镇力量的相对均衡,从而导致南北方的大分裂。北方有朱温、李克用等藩镇势力以及党项、契丹等少数民族力量的崛起。南方有王建、杨行密、

王审知等藩镇力量及早已强大的南诏少数民族政权的割据。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南北矛盾、藩镇间的矛盾、地方与中央的矛盾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唐朝的灭亡和国家的大分裂。

## (二)导致云南南诏势力的壮大

极大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南诏极盛时,其统治所及,《新唐书·南蛮传》说:“东距爨(即原来东部的爨区);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在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西南骠(在今缅甸曼德勒地区);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贵州遵义一带)。”<sup>[1]</sup>拥有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大渡河以南、缅甸北部中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政权。有些内容前已叙及,此不再详述。

## (三)导致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扩大

北方长期受胡人影响和长期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具有尚武精神,吃苦精神和坚韧毅力,而这种素质一直影响到近代。而南方不同地域则有不同文化,江浙尚奢华、尚文藻,这种地域文化在南朝已形成,唐以后迅速发展。云南则由于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差异明显,各地各族文化差异很大,就丧葬习俗

而言,《蛮书》卷八说:“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殓,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这是南诏兼并爨区以后的情况。语言方面,南方各地则逐渐形成了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等。至于南北方风俗、饮食、文化等差异尤为明显,甚至出现南北方互相歧视的潜意识和行为,此不再详述。

总之,唐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的稳定采取了一些治国理政的措施,有的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的则消极影响较大,固然,唐朝衰亡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唐朝实行的“重北轻南”战略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参考文献:

- [1]江应梁.中国民族史[M].民族出版社,1990:226.
- [2][3][4][7]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1:484、484、446、418.
- [5]司马光(北宋).资治通鉴[M].中国古籍出版社,1992:134.
- [6]宋祁,欧阳修(北宋).新唐书[M].商务印书馆,1989:213.
- 作者简介:李巍巍(1972-),男,山东龙口人,大理学院图书馆馆员,副高级职称。

(上接第9页)发展历程,同时为家庭成员的慎终追远、敬祖收宗、整合家庭提供有力的支持。

## (二)历史意义

从宋代家庭档案我们可以窥见宋代社会历史的进步。从社会观念的进步来看,普通民众的档案意识和法制意识得到增强,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的生存与发展而自觉地保存家庭档案已成为社会共识。其次,国家以完备的契税制度推动了家庭档案的发展,为维护正常的产权秩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彰显了宋代私有制的深化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的巨大社会进步。第三,广泛的档案显示了宋代民间社会生活的开放鲜活的气息,也是我们看到了宋代家庭和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可以说,宋代家庭档案既折射了一个家庭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也反映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进步和发展状况。宋代家庭档案也是我们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以各种形式保存下来的家庭档案,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经济上的,民俗上的,社会上的,以及一部分人的个性、私生活及特殊履历等种种素材都蕴含其中,是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宋代经济史、社会史、民俗史、法制史、政治史、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 参考文献:

- [1]彭莉.宋代婚俗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游彪,尚衍斌,等著.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第四章.人民出版社,2008.
- [2]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89.
- [3]李晓菊.宋代人物档案文献述论——以宋人别集为中心.档案学通讯,2009(4).
- [4]刘朴兵.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5]宋会要辑稿.食货,61-64.
- [6]清明集·卷6·以卖为抵当而取贖.
- [7]清明集·卷13·堂弟财物.
- [8]文献通考·卷193.
- [9]欧阳修全集·集古录目录.
- [1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第十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 [11]徐拥军,陈百华.古代印章社会功能考略.湖南档案,2002(6).
- [12]夷坚丁志·卷20·兴国道人;夷坚志补·卷12·梁野人.
- [13]于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第三篇第六章.中华书局,2006.
- [14]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第三章第三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5]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6]清明集·卷6·争山;夷坚三志辛·卷39·湘潭雷祖.
- [17]范磊,龚敏.家庭档案:中国档案实践传统的社会意蕴与文化反思.中国档案,2011(3).